

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2016年主题出版重点出版物
历史视野下的中华民族凝聚力系列丛书 / 郑师渠 主编

历史视野下的 中国家风文化

本书编写组 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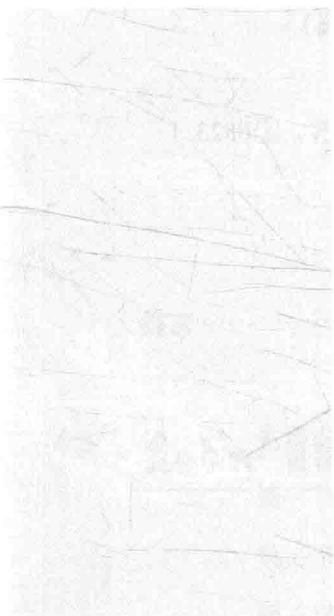
LISHI SHIYE XIA DE
ZHONGGUO
JIAFENG WENHUA

SPM

南方出版传媒
广东人民出版社

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2016年主题出版重点出版物

历史视野下的中华民族凝聚力系列丛书 / 郑师渠 主编



历史视野下的 中国家风文化

本书编写组 编

LISHI SHIYE XIA DE

ZHONGGUO

JIAFENG WENHUA

SPM

南方出版传媒
广东人民出版社
· 广州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历史视野下的中国家风文化 / 本书编写组编. —广州: 广东人民出版社, 2016. 12 (2017. 3 重印)

(历史视野下的中华民族凝聚力系列丛书/郑师渠主编)

ISBN 978-7-218-11590-0

I. ①历… II. ①本 III. ①家庭道德-研究-中国 IV. ①B823.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325264 号

LISHI SHIYE XIA DE ZHONGGUO JIAFENG WENHUA

历史视野下的中国家风文化

本书编写组 编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出 版 人: 肖风华

责任编辑: 曾玉寒

封面设计: 李桢涛

插画绘图: 李新慧

责任技编: 周 杰

出版发行: 广东人民出版社

地 址: 广州市大沙头四马路 10 号 (邮政编码: 510102)

电 话: (020) 83798714 (总编室)

传 真: (020) 83780199

网 址: <http://www.gdpph.com>

印 刷: 佛山市浩文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16.25 字 数: 250 千字

版 次: 2016 年 12 月第 1 版 2017 年 3 月第 2 次印刷

定 价: 90.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出版社 (020-83795749) 联系调换。

售书热线: (020) 83795240 83791487

前言

传统中国是一个“家国”同构的宗法社会。人们普遍重视家庭的地位与功用，因为它不仅是孕育生命和培养德性的起点，而且是国家社会发展的基础所在。《礼记·大学》说，“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国是家的扩大，自然家齐才能臻至国泰民安。同时，也惟其如此，人们普遍重视家庭教育，孜孜于传承与光大自家的传统与经验，终至形成各具特色的家教风格，即承载家族荣誉和令人钦羡的家风。历史上《孟母三迁》的故事传承不衰，就反映了这一点。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家风之优劣盛衰，成为关乎个人与家族荣辱的一种社会评价：子弟有高的素质，彬彬有礼，成才有为，人多赞曰“有家教”；反之，则斥之曰“少教”。此种现象，迄今犹然。

中国传统家风文化源远流长：肇始于先秦，经秦汉、魏晋南北朝之发展，到宋明时期达到鼎盛。与此相应，以



一部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文明征程，有着值得每个炎黄子孙、华夏儿女为之骄傲的丰富精神内涵：她有着千百年来耕读传家的儒家文化体系，有着兼容并蓄、海纳百川的博大胸怀，有着以和为贵、和而不同的深厚底蕴，更有着长期民族融合、共同奋进历程中所形成的血浓于水、追求一统的家国观念。

南北朝时期的《颜氏家训》为代表的门庭训规类著述，也随之大量出现。从文化史的角度看，中国传统家风文化显然具有以下两大特点：重视家庭及家庭教育既为普遍的价值取向，传统家风文化盛行，其涵盖、浸润整个社会，理有固然，既存在于贵族阶层，也存在于庶民阶层。其间风格异趋，自成特色，虽有精粗之别，却无贵贱之分。此其一。传统家风文化核心价值的范畴，一般都集注于：亲情与仁爱，礼仪与敬恕，宗祖与传承，躬行与身教，齐家与治国五个方面。而其取向，也都与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和社会的主流价值观一脉相通。例如，最负盛名的《颜氏家训》写道：“三世之事，信而有征，家世归心，勿轻慢也。其间妙旨，具诸经论，不复于此，少能赞述；但惧汝曹犹未牢固，略重劝诱尔。”这里所谓“家世归心，勿轻慢也”，是在提醒子弟：本家训的基本精神乃依托于整个中国历史文化传统和儒家典籍。对此当怀敬畏之心，不容轻慢。在谈到爱惜生命与舍生取义之关系时，又是这样说：“夫生不可不惜，不可苟惜。涉险畏之途，干祸难之事，贪欲以伤生，谗慝而致死，此君子之所惜哉；行诚孝而见贼，履仁义而得罪，丧身以全家，泯躯而济国，君子不咎也。自乱离已来，吾见名臣贤士，临难求生，终为不救，徒取窘辱，令人愤懣。”在他看来，肤发受之父母，子弟固当爱惜生命。但这并不意味着可以在危难之际，不必承担舍家为国、舍生取义、义不容辞之责任。《颜氏家训》所表达的家国情怀，既不失亲亲有杀，复表现了凛然

大义，显然又是与孟子所表述的儒家精神相契合：“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此其二。这两大特点说明，家风文化不仅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而且具体而生动地体现了中华民族的精神，是不容轻忽的。

固然，鸦片战争以降，随着中国传统社会的瓦解和欧风美雨沛然莫之能御，传统家风文化也渐失了往昔的兴盛，趋向式微。但是，同时也应看到，与整个中国传统文化在近代实现了内在超越并渐次走向复兴相一致，传统家风文化在融合中西的基础上，同样开始显露出新的生机与活力。近年来，曾为维新运动领袖的梁启超的梁氏家风成为人们热议的话题，颇能说明这一点。梁启超虽不曾有家训的专门著述，但透过他的家书，仍不难一窥其融合中西之家教新风。他一方面引导子女热爱和传承中国固有文化，自强不息，勇于承担社会责任，忠于国家；另一方面，又将近代科学与民主的精神引入家教，尊重子女的人格与志趣，鼓励和支持他们出国留学，追求科学与新知，并学成归国报效祖国，服务社会。任公共培养了九个子女，创造了“一门三院士，九子皆才俊”的佳话，是传统家风文化在近代转型和开辟了新生面的有力例证。耐人寻味的是，极力否定传统文化、主张全盘西化的胡适后代却都默默无闻。一位著名的胡适研究专家，在一次学术会议上叹息说，看来在培育子女问题上，胡适是不如更加重视中国传统文化

耕读传家



家庭的兴旺与国家、社会的发展休戚相关，家庭教化和家风建设，贵名节、重家声、培育优秀家风是中华民族历代先贤立家处世之本，同时也是中华民族家齐、国治、天下平的优良传统。

风文化在近代显示了自己新的活力，是值得我们重视的。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发展迅速，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人民生活也得到了很大提升。但无需讳言，包括理想信念之消解、诚信之不彰、物欲横流、道德衰堕在内，各种社会弊端也日渐显露，令人心忧。这些弊端的出现，自然有多方面的原因。但从许多青少年犯罪和一些官员贪污受贿的事实看，“少教”即家风荡然，至少也是一个重要原因。故重视家庭教育，继承和光大中国家风文化的优良传统，乃不失为振衰起弊的一种有益思路。著名的优生学专家潘光旦先生，早在20世纪20年代即提出：从优生学的角度看，要推动中华民族的发展，“我们以后要从人文选择的路径，把中华民族的品性重新整顿起来”，其中重要的一点，就是通过科学研究，对中国家庭制度所内含的“人文选择的能力”，“再加以估定和变通，而引今后优生教育的初步”。^①毫无疑问，中国传统家风文化之优良传统，乃属潘先生所说的“中华民族的品性”即“人文选择的能力”之应有之义。

这也正是本书的缘起。同时，将本书与《历史视野下的中华民族精神》一书一起列入《历史视野下的中华民族凝聚力系列丛书》，也就顺理成章。

2016年12月

^① 潘光旦：《人文选择与中华民族》，《新月》杂志第3卷第2期，新月书店1929年4月10日。

目 录

前言	001
第一章 先秦秦汉时期：中国家风文化的奠基	001
第一节 华夏精神与家风文化	002
第二节 先秦时代：中国家风文化的发端	014
第三节 “大一统”局面下的中国家风文化	029
第二章 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中国家风文化的启承	039
第一节 王朝兴替下波谲云诡的社会背景概述	040
第二节 魏晋南北朝家风文化的发展	044
第三节 隋唐时期家风文化的成熟	063
第四节 小结——家风伦理文化变迁与家风价值核心的成熟	071
第三章 宋元明清时期：中国家风文化的升华	075
第一节 宋元明清时期家风文化背景概述	076
第二节 宋元时期家风文化的繁荣	080

第三节	明清时期家风文化的鼎盛	092
第四章	晚清民国时期：中国家风文化的转型	106
第一节	近代中国社会的转型	106
第二节	晚清家风文化的嬗变	110
第三节	民国时期家风文化的转型	124
第五章	新中国家风文化的新发展	126
第一节	新中国的建立与华夏子孙的家国情怀	127
第二节	新时代家风文化的特点	132
第三节	新时代家风文化的新内涵	141
第六章	中国优秀传统家风文化的内核	150
第一节	孝悌亲情	150
第二节	重视礼仪规范	160
第三节	延绵的香火	168
第四节	家庭教育中的知行合一	176
第五节	“家—国—个人”三位一体	183
第七章	现代社会传统家风文化的嬗变	190
第一节	传统社会结构的解体	191
第二节	家庭生产活动的多元化	196
第三节	修齐治平观念的式微	202
第四节	伦理生活的现代缺席	209
第五节	现代西方思潮的侵袭	215

第八章 中国传统家风文化的现代价值	221
第一节 对传统家风文化中亲亲之情的辩护	223
第二节 美好生活的人类图景	230
后 记	245

第一章 先秦秦汉时期： 中国家风文化的奠基

一般来说，家风是一种由父母（或祖辈）所提倡的并能身体力行和言传身教，用以约束和规范家庭成员的一种风尚和作用^①。“家风”作为一种家庭（家族）伦理^②风尚，并不只是一个先验的观念，而毋宁是在历史的发展中不断充实其内容。肇其端者，则可追溯至先秦时代。雅思贝斯曾在《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一书中提出“轴心时代”这一命题：认为在公元前500年左右之时，中国、西方和印度等文明皆出现重大突破，在“轴心时代”中，各个文明都出现了伟大的精神导师，而其所缔造之

① 罗国杰：《论家风》，《中国火炬》2000年第3期。

② 这里所使用的伦理（ethic）一词与道德（morality）有着根本的不同：前者所关注的焦点在于人，即行动者，而后者所关注的则是行动的规则，它甚至可以不考虑行动者的道德动机。在《对伦理的现象学复原》[《中国现象学与哲学评论（第七辑）》]一文中，德国现象学家黑尔德对此问题做出有益的讨论。他通过对伦理（ethic）一词的现象学还原，认为古希腊的“伦理”是为有着自由意志的人类提供一个特殊的居留地。这个特殊的居留地是主体间的可靠性活动空间，依凭它我们可以在共同的生活中达到一个共同的目的。古希腊的“伦理”和近代的“道德”之间的一个根本性的历史差异：“伦理”展示的是生活世界的规范性[这种规范性是一种关乎德性（virtue）的规范性，而非规则（rule）的规范性，后者恰恰是现代道德哲学所要关注的重点]，而近代的“道德”所依据的只是这种规范性的临界状况，却把它提升为正常状况。作者这里（也包括下文的使用）即是从这一意义上来使用“伦理”一词，它更加倾向古典世界中人格的德性及其内在结构，这与中国传统更加关注行动者的德性修炼的思想主张更为契合，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了解家风文化中所呈现出来的核心价值。

精神也一直影响至今，在中国则以孔子及其思想为代表。我们知道，孔子以自觉继承与发扬夏、商、周三代之文化为其担当，而所谓“家风”文化中最为核心价值又受儒家影响最大，故此探源“家风”文化之始端必从考察三代及其更前时代之历史文化入手。

第一节 华夏精神与家风文化

我们常常使用“华夏”“中华（中国）”这样的词汇来表达自己的文化认同或身份认同，不过，这些概念最初是与“民族”这个概念联系在一起的。今天，国内学界使用“民族”一词，通常有两个层次的涵义：nation 意义上的民族是从政治体制和现代国家主权上强制划分的群体范畴；ethnic group 意义上的族群是从历史传统和文化特征上彼此区分的群体概念。^① 我们这里使用的“华夏族”一词是用前一层次的意义，包括生活在当今中华人民共和国疆域内的所有族群，是多族群的统一体。也就是像社会学家费孝通说的，“我将把中华民族这个词用来指称现在在中国疆域内具有民族认同的十一亿人民。它所包括的五十多个民族单位是多元，中华民族是一体，它们虽则都称‘民族’，但层次不同”。这种观念在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发表的《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宣言书》中即已阐明：“国家之本，在于人民。合汉、满、蒙、回、藏诸地为一国，即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是曰民族之统一。”因此，当我们使用华夏族这个概念的时候，是要表示一种“你来我去、我来你去，我中有你、你中有我，而又各具个性的多元统一体”^②。

考察华夏族之形成及其内在精神的理由之一便是这种文化或身份上

① 湛华玉：《关于族群、民族、国籍等概念的翻译与思考》，《读书》2005年第11期。

② 费孝通等：《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9年版，第1页。

的认同，这意味着它作为一种类似文化基因的东西镶嵌在我们的骨髓之中，理解“家风”文化应从理解“族群”文化开始。另外，先秦（特别是夏、商、周三代及其以前）的家庭结构并不十分稳定，其产生、扩张与分解和华夏族群的形成过程有内在的一致性，这个过程伴随着华夏族内部（及其与外部之蛮夷部落）之间的战争和姻亲活动而呈现出来。

远古时代，在我国广袤的土地上便聚居着许多部落，而在这些形形色色的部落中，黄帝部落与炎帝部落为各方国部落之主导者。炎、黄部落也被认为是后来华夏族的最大族源。徐旭生先生曾经提出过的中国远古三集团说即是代表，他认为：“华夏、夷、蛮三族实为秦汉间所称的中国人的三个主要来源……从较古的春秋时期或战国前期的传说仔细爬梳，还不难看出在此前的部族的确分为三个不同集团的痕迹。”又说：“（华夏集团）是三集团中最重要的集团，所以此后它就成了我们中国全族的代表……此部族中又分两个大亚族：一个叫作黄帝，一个叫作炎帝。”^①徐先生提出的三集团说至今仍有其影响。这种说法认为华夏作为一族，虽后又再区分为炎、黄两个大的亚族，有利于我们从经济、文化构成之差异上来理解华夏与夷、蛮部族之间的不同，可是这种划分至少从表面上容易使我们忽视华夏族之形成乃是一个历史过程，而这一过程又是在与其他少数民族的交流与融合中进行的。在这个意义上，炎黄两个部族虽是构成华夏族之大者，可是绝不仅限于此二者。关于华夏族形成的确切时间，郭沫若、谢维扬、刘泽华等学者有所提及。

郭沫若先生在《中国史稿》一书中指出：原始社会末期，“随着社会生产的发展和人口的增加，氏族部落的不断迁移和相互交往的扩大，各个部落之间在某些时候、某些地方形成相反的利益，而在另一些时候和另一些地方又形成了相同的利益，由此引起了各个部落的分化和组合、战争和联盟，逐渐形成为不同的民族。华夏族就是这样开始形成的”^②。

^① 徐旭生：《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增订本），科学出版社1960年版，第39、40页。

^② 郭沫若：《中国史稿》第一册，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第122页。

这是将华夏族的形成时间确定在原始社会末期，即进入文明时代之前。与此稍有不同，谢维扬先生撰文指出，华夏族应形成于夏代，他还提出两大理由：第一，“国家的形成也就是文明民族形成的过程，因而可以说，在夏代国家形成的同时，也形成了我国最早的文明民族，即华夏族”；第二，“华夏族族名同夏代国家名称的联系，对于确认华夏族是在夏代国家形成的同时形成的，是一个有力的佐证”。^①这两种说法表面上看有所不同，不过其内在的叙述逻辑基本一致，即将民族与国家这两个概念直接关联，认为二者的产生发展是一个若合符节的过程，这种观念我们可以在摩尔根的论说中得到确证：“在氏族制度下，民族尚未兴起；要等到同一个政府所联合的各部落已经合并为一体，就像阿提卡的雅典人四个部落的合并、斯巴达的多利安人三个部落的合并、罗马的拉丁人和萨宾人三个部落的合并那样，才有民族兴起。”^②这种叙述逻辑显然更加突出民族这一概念的政治面向，而其对背后所蕴含的生物（即血缘）和文化基础则关注不足。事实上，这种做法仍有观念先行的嫌疑，而一种类似于历史发生学的叙说方法可能是更加适合的做法。在这种意义上，刘泽华先生的看法可能更为准确：“在长期的经济、政治、文化交往过程中，居住在黄河、长江流域的各民族逐渐融合为具有共同文字、共同经济以及相近的生活习俗的华夏族（汉族的前身）。‘四海之内若一家’，正是这种情况的反映。华夏族的形成以及它同其他少数民族联系的加强，也是要求政治统一的一个重要因素。”^③尽管刘先生的论证并不见得是一个发生学意义的过程呈现，不过这种看法更加强调整华夏族是在与周围部族的互动中形成的，而这种互动包括经济、政治和文化等方面，其互动形式常以征伐与姻亲等方式进行；在这个意义上，华夏族形成之历史也是一段各个不同族群融合之历史。

① 谢维扬：《论华夏族的形成》，《社会科学战线》1982年第3期。

② [美]摩尔根，杨东莼等译：《古代社会》上册，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第117页。

③ 刘泽华等：《中国古代史》上册，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224页。

在华夏族形成的过程中，战争是其中一种表现形式。炎、黄二部族作为远古时代大的部落，它们曾与周围少数部族之间发生过一些战争，司马迁的《史记》中便有记载：

黄帝者，少典之子，姓公孙，名曰轩辕。生而神灵，弱而能言，幼而徇齐，长而敦敏，成而聪明。轩辕之时，神农氏世衰。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而神农氏弗能征。于是轩辕乃习用干戈，以征不享，诸侯咸来宾从。而蚩尤最为暴，莫能伐。炎帝欲侵陵诸侯，诸侯咸归轩辕。轩辕乃修德振兵，治五气，艺五种，抚万民，度四方，教熊黑貔貅羆虎，以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三战，然后得其志。蚩尤作乱，不用帝命。于是黄帝乃征师诸侯，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遂禽杀蚩尤。而诸侯咸尊轩辕为天子，代神农氏，是为黄帝。天下有不顺者，黄帝从而征之，平者去之，披山通道，未尝宁居。东至于海，登九山，乃岱宗。西至于空桐，登鸡头。南至于江，登熊、湘。北逐荤粥，合符釜山，而邑于涿鹿之阿。^①

这段文字末尾所描绘的黄帝征伐时之足迹，能够帮助我们了解华夏族形成过程中地域的扩张，确定其最初的地理位置。不过，这并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问题在于，黄帝对其他部族的“征伐”是一种以大欺小的行为，其背后的行动逻辑是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吗？这种行动逻辑对塑造整个华夏族之精神价值有着直接影响。提示问题答案是“天下有不顺者，黄帝从而征之，平者去之，披山通道，未尝宁居”这一句话。“从而征之”，一个“从”字告诉我们黄帝征伐之所由出并非自己私我之好恶，其征伐乃是从“天”而出。“天”作为征伐活动的根据，它是正义的价值源头，然而这个“天”并不完全是一个虚拟的人格神形态（尽

^① 《史记·五帝本纪》。